

地区收敛与共同富裕： 进程、归因及其实现

苏红键

[摘要]地区收敛理论旨在研究贫穷地区能否及如何达到发达地区水平,为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利用中国1981—2020年省级数据和2000—2019年城市数据分析了地区经济收敛特征,结合其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地区收敛和共同富裕的建议。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总体表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但2014年以来收敛特征不显著;第二,分类型样本收敛特征显著且 β 系数接近,稳健性较强;第三,地区收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要素流动限制、自然禀赋差异、人文环境差异以及空间均衡关系;第四,为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要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空间分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服务均等、加强区际合作,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

[关键词]地区收敛;共同富裕;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地区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2)07—009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福祉、空间均衡与城镇化方略”(20FJLB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红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城镇化与城乡区域发展。北京100732

引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①其中,缩小地区差距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邓小平在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时的出发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当前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共同富裕和个体收入差距问题,对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的研究还很少。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地区收敛理论视角分析地区之间共同富裕问题。

从理论视角看,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共同富裕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地区经济收敛的相关研究,这源自国家和地区间经济收敛研究,即“贫穷国家和地区能否收敛到富裕国家或地区水平”(Barro,1991)^[2]。这正对应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缩小和共同富裕的问题。由于一国内部地区间在技术和制度上的差异相对国家之间更小,地区经济收敛更容易实现。根据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两种收敛的概念,当贫困地区比富裕地区增长更快时,实现绝对收敛(也称 β 收敛);当地区增长率与

其收入水平和稳态之间的差距正相关时,地区之间的收入离差缩小,实现条件收敛(也称 σ 收敛)。绝对收敛是条件收敛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因为倾向于增加离差的新扰动会抵消收敛的进程(Barro & Sala-i-Martin,2004)^[3](P.461-496)。

国内关于地区收敛的研究兴起于2000年前后,回应了1990年代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为2000年代初期四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持,主要是关于地区经济分异与收敛特征的分析。以往研究关于2010年之前的人均GDP收敛特征、阶段特征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在1990年之前存在绝对收敛,1990年代呈现发散趋势,2000年开始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而逐步收敛(许召元和李善同,2006;^[4]沈坤荣和唐文健,2006;^[5]刘生龙等,2009;^[6]潘文卿,2010^[7])。另有对全要素生产率地区收敛特征的分析得到类似的阶段特征(傅晓霞和吴利学,2006)^[8]。这与图1显示的各地人均GDP差异演进的阶段特征基本一致。以往研究在对总体收敛特征进行分析时,还得到了分地区(东中西部)“俱乐部收敛”特征(沈坤荣,马俊,2002;^[9]潘文卿,2010^[7])。近年来,地区发展格局有所调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人均GDP收敛趋势放缓并呈现发散态势(见图1),因而有待将研究阶段延伸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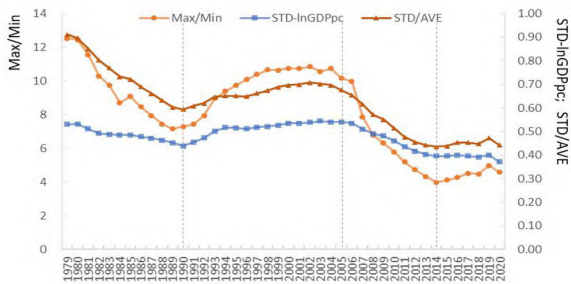


图 1 人均 GDP 地区差异的演进特征(1979 - 2020 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Max/Min 表示各省份人均 GDP 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STD - lnGDPpc 表示各省份人均 GDP 的对数标准差;STD/AVE 表示各地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三种差异算法的内涵基本一致,表现出同样的阶段特征。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本文基于地区收敛理论,分析当前中国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的进程、影响因素及其实现路径。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第一,由于在标准生产模型中假定人均产出与人均收入相等(Barro & Sala - I - Martin, 2004),^[3]以往研究主要采用人均 GDP 指标衡量地区经济收敛特征,本文以各地人均收入水平进行分析。这与共同富裕强调的居民收入相对应,由于大规模人口迁移,各地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会存在偏差。第二,本文分别利用 1981 - 2020 年省级数据和 2000 - 2019 年城市数据分析地区之间人均收入收敛特征,从不同区域层面得到关于中国地区收敛特征的相互支持的结论。第三,结合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区域和城市经济等相关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从要素流动限制、自然禀赋差异、人文环境差异、空间均衡关系等方面,为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建立了理论分析框架,为这一宏观战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学理支持。

一、中国地区经济收敛特征

本部分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和城市数据,从不同区域层面,分析地区经济条件收敛(σ 收敛)和绝对收敛(β 收敛)的总体特征、阶段特征以及分类样本特征(俱乐部收敛),得到了相互支持的结论。

(一) 省级层面的收敛特征

省级层面数据具有系统性较好、时期跨度较长的特征,本部分首先采用 1981 - 2020 年各省份数据,分析省际人均收入收敛特征。

1. 条件收敛特征

图 2 分别汇报了各省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异演进情况,以人均收入的对数标准差分析其条件收敛特征。第一,各地人均收入条件收敛表现出阶段特征,近期收敛特征不显著。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 1994 年前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对数标准差明显提高,表现出发散的特征,这与此阶段各地人均 GDP 收敛特征不同,与改革开放之初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有关;随着 19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快速城镇化,以及 2000 年以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1994 - 2013 年前后,人均收入呈现波动式收敛特征;近年来,各地之间的城乡居民收入收敛特征略有不同,各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稳中扩大,这与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相对应,各地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现缩小态势,这体现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对各地农村居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地区发展格局进入新阶段。第二,不包括直辖市的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低于全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由于北京、上海的收入水平明显更高,不包括直辖市时,地区之间城镇、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均明显更小,2020 年二者差距约为 0.06 对数标准差。第三,各地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2020 年,全部省份和不包括直辖市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对数标准差分别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数标准差约 0.08 和 0.09。由于地区之间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收敛演进特征基本一致,考虑农村居民收入自 2013 年起调整了统计口径,本文后续主要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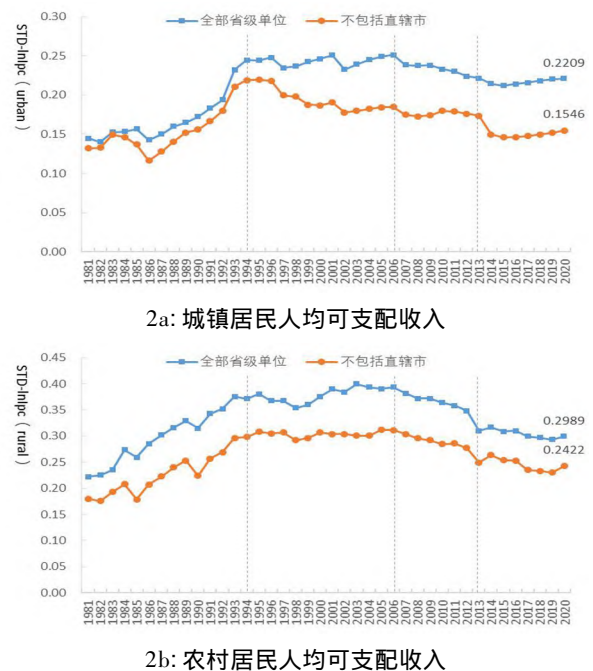


图 2 各省份人均收入差异的演进特征(1981 - 2020 年)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根据农村居民收入的统计口径,2013 年之前为农民人均纯收入,2013 年开始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 绝对收敛特征

本部分分析各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收敛特征,主要采用检验绝对收敛的经典模型(Barro, 1991):

$$\frac{1}{T} \ln \left(\frac{Ipc_{i,t+T}}{Ipc_{i,t}} \right) = \alpha + \beta \ln Ipc_{i,t} + \mu_i + \mu_t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frac{1}{T} \ln \left(\frac{Ipc_{i,t+T}}{Ipc_{i,t}} \right)$ 表示 $t \rightarrow t + T$ 期间对数收入年均增长率, $Ipc_{i,t}$ 表示省份 i 第 t 期的人均收入水平, β 为收敛系数, μ_i 和 μ_t 分别用来控制个体和时期的异质性, $\epsilon_{i,t}$ 为误差项。利用中国各省份 1981 - 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分别以 $T = 10$ 和 $T = 20$ 、分类型样本对公式(1)进行估计,以检验长期收敛的稳健性。综合不同的时间段,构建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控制遗漏变量、时间趋势问题。根据估计结果(见表 1) 第一,各地收入水平在 10 年期和 20 年期均表

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在总体样本和分类型样本中结果稳健。结合系数来看,10 年期的系数约为 -0.09,20 年期的系数约为 -0.045,20 年期的系数为 10 年期系数的 1/2,这与 Barro and Sala - I - Martin(2004) 的观点一致,当间隔变长时,初始值对年均增长率的影响下降。第二,分类型样本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均显著,且收敛系数与总体样本的系数接近,东北地区由于样本量较少,显著性略低。第三,对直辖市和非直辖市省份进行分类研究,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四个直辖市中,天津、重庆表现出一定的追赶效应,非直辖市省份的收敛系数与总体样本接近(由于控制了个体效应,表现出较好的稳健性)。第四,沿海地区省份和非沿海地区省份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且 β 系数在不同的时期跨度中均与总体样本接近,结果稳健。

表 1 各省份人均收入 β 收敛估计 ($T = 10$ 和 $T = 20$)

$T = 10$	总体样本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东北省份	直辖市	省、自治区	沿海省份	非沿海省份
L10. lnI	-0.0924***	-0.0919***	-0.0893***	-0.1016***	-0.1028**	-0.0602***	-0.0944***	-0.0942***	-0.0829***
	(0.0026)	(0.0021)	(0.0156)	(0.0146)	(0.0219)	(0.0076)	(0.0020)	(0.0014)	(0.0072)
C	0.6952***	0.7075***	0.6652***	0.7469***	0.7478**	0.5129***	0.7041***	0.7183***	0.6308***
	(0.0173)	(0.0170)	(0.0949)	(0.0904)	(0.1354)	(0.0506)	(0.0135)	(0.0117)	(0.0454)
时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930	300	180	360	90	120	810	330	600
R ²	0.9490	0.9645	0.9721	0.9282	0.9729	0.9763	0.9485	0.9640	0.9370
$T = 20$	总体样本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东北省份	直辖市	省、自治区	沿海省份	非沿海省份
L20. lnI	-0.0512***	-0.0511***	-0.0416***	-0.0474***	-0.0485	-0.0445***	-0.0510***	-0.0515***	-0.0459***
	(0.0012)	(0.0006)	(0.0071)	(0.0076)	(0.0206)	(0.0044)	(0.0013)	(0.0012)	(0.0058)
C	0.4479***	0.4596***	0.3821***	0.4198***	0.4214*	0.4247***	0.4438***	0.4578***	0.4106***
	(0.0074)	(0.0047)	(0.0438)	(0.0456)	(0.1238)	(0.0286)	(0.0076)	(0.0078)	(0.0345)
时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20	200	120	240	60	80	540	220	400
R ²	0.9827	0.9911	0.9920	0.9698	0.9786	0.9920	0.9817	0.9900	0.9762

注: L10、L20 分别表示滞后 10 期和滞后 20 期。括号中为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显著。下同。

考虑 2014 年以来各地收入对数标准差稳中略升,对不同时期到 2020 年的收敛特征进行检验(见表 2)。采用全部省份样本时,显著性明显较低,仅 2000 - 2020 年、2010 - 2020 年略显著,这主

要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的快速城镇化和大规模人口迁移,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了省际收入差距有关;不包括直辖市时,中长期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2014 - 2020 年的收敛系数

不显著。全部样本收敛的显著性较低,主要是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省份,2020 年分别为 75602 元和 76437 元,最高的非直辖市省份为浙江(62699 元),高于天津(47659 元)和重庆(40006 元)。2014-2020 年的收敛系数在两类模型中均不显著,与图 2a 呈现的阶段特

表 2 各省份人均收入不同年份到 2020 年的收敛特征

	$dI_{2014-2020}$	$dI_{2010-2020}$	$dI_{2000-2020}$	$dI_{1990-2020}$	$dI_{1981-2020}$
全部省份	-0.0002	-0.0103 [*]	-0.0085 ^{**}	-0.0005	-0.0010
	(0.0078)	(0.0057)	(0.0032)	(0.0051)	(0.0057)
不包括直辖市	-0.0067	-0.0204 ^{***}	-0.0145 ^{***}	-0.0101 ^{**}	-0.0120 ^{**}
	(0.0127)	(0.0065)	(0.0042)	(0.0047)	(0.00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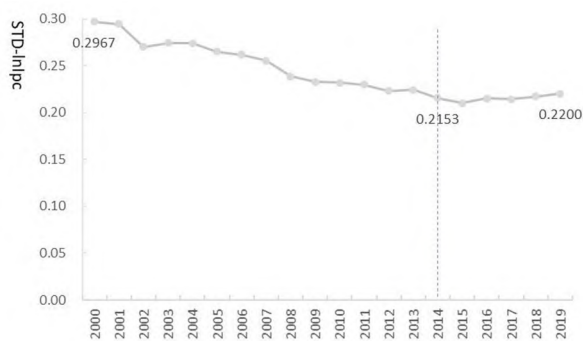
注: dI 表示 $\frac{1}{T} \ln \left(\frac{I_{pc_{i,t+T}}}{I_{pc_{i,t}}} \right)$ 。

(二) 城市层面的收敛特征

本部分采用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0-2019 年数据,分析城市之间人均收入收敛特征,为省级数据分析结论提供补充和支持。

1. 条件收敛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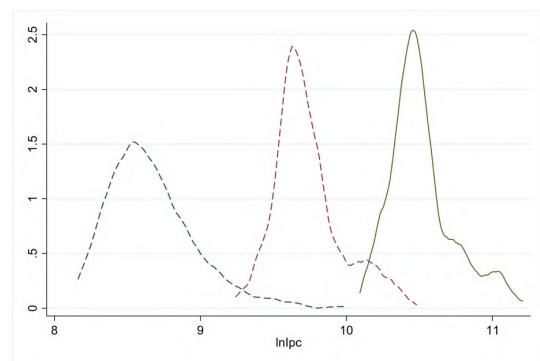
图 3 汇报了各个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的条件收敛特征,与各省份条件收敛的总体特征和阶段特征一致。第一,总体来看,由于城市样本比省级样本多,从而其收敛特征的波动性



3a: 人均收入对数标准差演进情况

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 2014 年以来地区收敛特征不显著。这与近年来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相对应,虽然南北经济差距主要是总量差距扩大,但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均收入的收敛态势,其主要解释包括南北市场化程度差距、自然条件差异、增长方式差异(邓忠奇等,2020)^[10]等。

较小,总体表现出逐步收敛的特征,人均收入对数标准差从 2000 年 0.2976 降低到 2019 年 0.2200 (见图 3a)。这也体现在 2000-2019 年各城市人均收入的核密度分布上,其集中度明显提高(见图 3b)。第二,分阶段看,2014 年前后的节点特征依然存在,2014 年人均收入的对数标准差为 0.2153,低于 2019 年值,2014-2019 年城市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呈现稳中略升的特征,收敛特征不显著。



3b: 核密度分布(2000 年、2010 年、2019 年)

图 3 城市人均收入差异的演进特征(2000-2019 年)

2. 绝对收敛特征

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2000-2019 年数据,采用平衡面板(删掉个别数据不全的城市)双向固定效应,以 $T=10$ 对公式(1)进行估计(见表 3)。第一,城市之间人均收入绝对收敛的研究结果与省级数据的结论类似,地区经济 β 收敛特征和俱乐部收敛特征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城市总体样本和分类型样本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系数约为 -0.11,绝对值略高于省级样本系数(-0.09),各类地区样本的 β 系数均显著且与总体样

本模型的数值接近。第二,城市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近年来地区收敛特征不显著。图 4 对不同时期到 2019 年的城市人均收入收敛特征的分析表明,时期越长,收敛性越显著;2000-2019 年,基期城市人均收入与其增长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2010-2019 年收敛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2014-2019 年的收敛性不显著,这与利用省级数据发现的近期地区收敛性降低的特征一致,也与 σ 收敛的阶段特征一致,也证明了绝对收敛是条件收敛的(充分非必要)前提条件。

表3 城市人均收入 β 收敛估计($T=10$)

	总体样本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东北城市	中心城市	其他地级市	沿海城市	非沿海城市
L10. lnI	-0.1110*** (0.0030)	-0.0948*** (0.0024)	-0.1153*** (0.0038)	-0.1258*** (0.0038)	-0.1446*** (0.0096)	-0.1075*** (0.0110)	-0.1115*** (0.0030)	-0.0950*** (0.0032)	-0.1165*** (0.0038)
C	1.0684*** (0.0258)	0.9465*** (0.0215)	1.0963*** (0.0323)	1.1855*** (0.0328)	1.3438*** (0.0811)	1.0639*** (0.0979)	1.0693*** (0.0256)	0.9524*** (0.0286)	1.1104*** (0.0322)
时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760	820	800	810	330	350	2410	490	2270
R ²	0.8663	0.8730	0.9177	0.8955	0.8958	0.8771	0.8662	0.8996	0.8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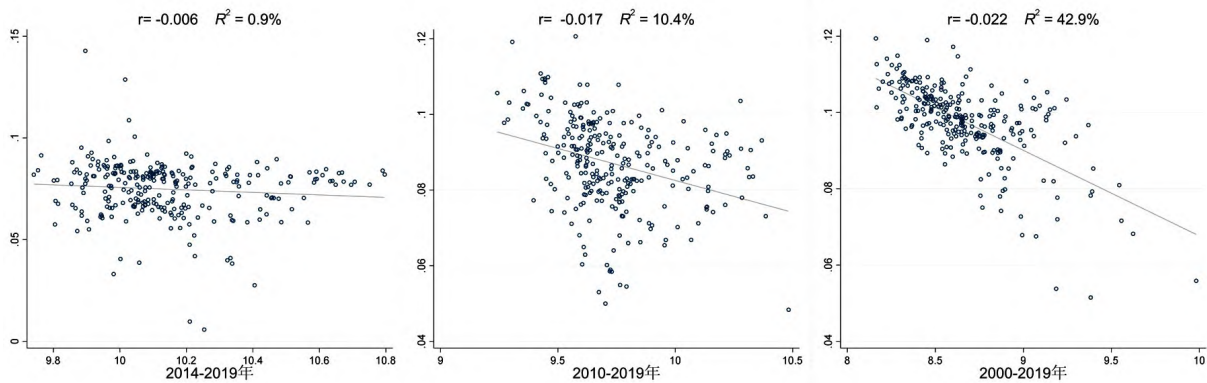


图4 城市人均收入不同时期到2019年的收敛特征

二、影响地区经济收敛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经济总体表现出显著的收敛特征,同时伴随政策调整,呈现一定的阶段特征,近期收敛特征不显著。影响地区经济收敛的因素与推动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紧密相关。一方面,结合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理论观点(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4;^[3] Acemoglu, 2009^[11] P. 18-20),由于一国内部地区之间技术、制度的差异较小,影响地区经济收敛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流动限制以及自然禀赋、人文环境的异质性;^③另一方面,结合区域和城市经济理论观点(Glaeser and Gottlieb, 2009)^[12]地区之间的空间均衡,不是指收入相等,而是综合福祉的均衡。综合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 要素流动限制

要素自由流动是地区收敛的重要前提条件,地区之间较高的要素流动性,也是其相对于国家之间更容易收敛的原因(Barro and Sala-i-Martin 2004)^[3]由于一国内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影响地区收敛的要素流动限制,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其中的土地供给限制往往会通过空间约束、高房价转化为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一方面,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迁移的约束与人

均收入的地区收敛特征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前后,正是由于较严格的人口迁移限制,使得虽然各地人均GDP是收敛的,但各地人均收入是发散的;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快速城镇化、渐进式户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了人口迁移限制,从而也促进了各地人均收入的收敛。当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依然存在较高的落户限制,其人均收入水平较其他省份明显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在省级层面的收敛特征研究中加入直辖市之后,收敛性显著降低的原因。

另一方面,土地供给限制在影响城区空间扩张的同时,通过经济壁垒影响劳动力流动,进而影响地区收敛。这在关于土地资源空间错配的研究中形成了共识,且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现象,Hsieh & Moretti(2019)^[13]、Duranton & Puga(2019)^[14]均认为,生产率较高城市的现有居民倾向于通过较严格的土地和住房规划,提高进入壁垒,从而以降低潜在进入者的福祉为代价,最大限度提高现有居民福祉。在国内,城市房价已经成为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经济壁垒,对于一些建设用地和住房供给紧张的超大特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等,收入房价比往往更低,进入壁垒更高,也有如重庆、长沙等超大特大城市,由于土地和住房供给约束

较小,进入壁垒较低(苏红键 2020)。^[15]

(二) 自然禀赋差异

具有类似技术和偏好的经济体倾向于收敛于稳态(Barro, 1991)^[2],但由于自然禀赋异质性的存在,即便是在稳态,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依然存在。影响地区发展的自然禀赋主要包括地理区位、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地形地貌等。这与 Acemoglu(2009)^[9]总结的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中的地理因素相对应。

第一,各地中心城市、沿海城市等地理区位条件较好的城市往往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根据本文的城市样本,2019年,各地中心城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698元,比其他地级城市平均收入水平(36354元)高约1/3,这既与行政级别有关,也与中心城市优越的交通区位相关;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其他城市约30%。

第二,气候舒适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发展。Barro(1991)论证了气温(采用供暖天数的对数)对移民进而对地区收敛的影响,Glaeser & Gottlieb(2009)^[12]研究发现1月气温是美国过去50年城市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Cheshire & Magrini(2006)^[16]在欧洲国家内部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现象也证明了冬季气温(作为气候舒适度的核心变量)对地区发展的重要性。

第三,自然资源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Habakkuk(1962)^{[17] P.1-15}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使美国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实现了19世纪的繁荣;Greenspan & Wooldridge(2018)^{[18] P.13-15}进一步强调了美国从未因为自然资源匮乏制约经济增长。在经济转型期,“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凸显,这也是近期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第四,与山地相比,平原和丘陵地区更适宜居住,因为平原和丘陵地区的城市建设成本更低、交通成本更低、市场潜能更高。封志明等(2007)^[19]较早利用中国地形起伏度数据,证明了地形与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关系。

(三) 人文环境差异

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类似,在各地存在异质性,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人文环境差异要小于国家之间的差异,但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地区城市之间深植于人文环境的营商环境会存在差异,从而会影响各地经济发展和地区收敛。这与 Acemoglu

(2009)^[9]总结的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中的文化、制度因素相对应。

近期有研究明确了文化趋同对国家之间经济收敛的促进作用。Michael et al.(2021)^[20]证明了国家之间的文化趋同是1990年代以来跨国经济增长趋同的重要条件之一。其通过对不同时期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 Survey)的总结,证明了自1990年以来国家之间的文化趋同,其中,十个衡量文化特征的指标中有八个逐渐趋同,包括平等意识、政治参与、对待权威的态度、对待家庭和工作的态度、对待传统的态度等,这与关于跨国文化趋同与文化融合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结论一致。

在一国内部,文化同质性更高,从而地区经济更容易趋同,但根植于人文环境的营商环境,会影响地区发展和收敛。近期,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有观点强调主要是营商环境、市场化程度的差距。随着“投资不过山海关”逐渐成为“共识”,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成为东北衰退、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21]构建营商环境指数对中国城市评价发现,各地中心城市的营商环境相对优势逐渐扩大,东部、中部地区城市营商环境明显优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南北营商环境的差异逐渐扩大。

(四) 空间均衡关系

空间均衡是区域和城市经济研究的核心理论,从另一视角对地区收敛和地区之间共同富裕提供了解释。伴随追求福祉最大化的人口迁移,地区之间会形成综合福祉的空间均衡关系,而不是各地收入相等,人均收入的差距是必然存在的。

空间均衡理论首先被Alonso(1964)^{[22] P.18-35}和Muth(1969)^{[23] P.1-30}应用于单中心城市内部的土地价格和土地利用分析,之后被Rosen(1979)^[24]和Roback(1982)^[25]应用于城市之间的生活质量比较,近年来在城市和区域实证研究中快速发展。根据该理论,影响居民福祉、进而影响居民迁移行为的因素不只是名义收入,还包括舒适度、房价、通勤成本等因素。Rosen(1979)^[24]和Roback(1982)^[25]正是基于这一福祉空间均衡关系,利用各个城市的房价、收入等指标,对城市之间无法量化的舒适度(生活质量)指标进行评价。

根据空间均衡思想,由于各地自然环境和便利设施的舒适度不同,各地综合福祉均等化,意味

着相对收入、名义收入等不会相等,人均收入差距必然存在。如果一个城市有较高的舒适度,那么相对收入(控制住房价格的工资)往往较低,高收入、高舒适度的溢价,会被高房价抵消;如果一个城市舒适度较低,则相对收入可能较高。这一空间均衡关系与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一致。北京、上海的收入水平较高、公共服务水平较高,其房价也较高的;同样作为超大城市的重庆,收入水平不高,房价也不高;沿海城市的收入水平较高、自然环境舒适度水平较高,其房价水平往往较高;东北地区收入水平较低、自然环境舒适度较低,其房价水平不高;一些中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收入水平较高,但自然环境的舒适度较低,从而降低了其人口吸引力和房价水平。

三、地区收敛视角共同富裕之路

地区收敛意味着贫穷地区以较高的增长率实现对富裕地区的追赶,从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地区之间共同富裕。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立足中国地区经济收敛特征,结合地区收敛的影响因素,为推动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要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空间分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服务均等,加强区际合作。

(一) 继续深化改革,提高要素自由流动水平

劳动力自由迁移,会实现经济总量与人口规模的协调,促进地区收敛和空间均衡,而受约束的劳动力迁移,则会固化甚至扩大地区差距。当前,中国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的资源错配现象比较普遍,未来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重点要提高劳动力流动和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水平。第一,加快推进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提高社会保障统筹水平,加快实现户籍制度回归人口登记管理的功能,以此提高人口自由迁移水平(苏红键,2020)^[26]。当前,部分特大超大城市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所在,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着力点,以服务均等化引领改革。第二,积极稳妥建立城乡、区域统筹的土地制度。针对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土地资源错配现象以及由此引致的房地产市场结构性特征、市民化的经济壁垒,要科学落实人地挂钩,实现建设用地与常住人口挂钩,建设用地供给与人口增长趋势挂钩,降低土地和住房供给对人口迁移的限制,按发展规律引导劳动力、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优化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治理体系。针对受

行政区划制约的城市群发展、大都市区发展,积极创新城市群发展的分工合作机制,探索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机制,切实降低中心城市扩张的行政约束和城市群分工合作的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集聚经济和分工经济。

(二) 促进空间分工,因地制宜推动地区发展

从柏拉图到亚当·斯密,再到之后的区位论、区域分工、国际贸易、空间分工理论,按照自然禀赋进行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义(苏红键,2016)^[27](P.17-38)。在“四大板块”发展战略基础上,未来要尊重各地自然禀赋的异质性和发展规律,提高政策的差别化和精准化水平,因地制宜促进空间分工和地区专业化。第一,考虑沿海地区,特别是冬季温暖沿海地区在自然禀赋上的优越性,积极建设沿海经济带(黄金海岸),创新探索提高沿海城市建设用地供给弹性,充分发挥其集聚经济和辐射带动作用,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第二,内陆地区交通区位优势显著的城市(以各地中心城市/省会城市为主),要积极打造核心增长极,发挥地区发展的引领作用、核心载体功能,带动各地城市群、各省份城市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第三,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比如中西部山区、偏远地区,要重点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态环境补偿、对口帮扶等,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稳步提升当地居民的综合福祉水平。第四,尊重东北地区人口迁出规律和粮食生产优势,通过利益补偿、基础设施建设等,着力强化东北地区粮食主产区功能,加强优质耕地保护,引领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发展。

(三)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包含文化、制度等因素的综合营商环境是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人文环境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体现。在尊重自然禀赋和发展规律基础上,未来要积极补齐各地营商环境短板,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缩小营商环境差距,促进地区收敛和共同富裕。第一,东部地区营商环境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未来重点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有利于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创新、高效能治理的营商环境。第二,针对“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原因,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重点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强契约精神培养和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第三,针对中西部地区营商环境短板,以吸引产业转移或返乡

创业就业、就地就近城镇化为目标,重点需要加强各类职业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法制精神和契约精神,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第四,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要积极借鉴东部地区营商环境建设经验,缩小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在法治精神、契约精神、政府服务等方面的营商环境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收敛。

(四) 推进服务均等,实现高水平福祉空间均衡

共同富裕不只是地区经济的收敛,而是综合福祉的均等化,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④。为此,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上,各地要积极推进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提高各地居民精神福祉、健康福祉等综合福祉水平(苏红键,2020)。^[14]第一,全面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加快推进落实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在各地全面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高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⑤第二,促进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相关,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降低地区居民之间的福祉差距,重点需要通过转移支付、地区合作等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县镇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力度,补齐落后地区公共服务短板。第三,促进各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城乡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逐步实现了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苏红键,2021),^[28]未来在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重点要积极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公平、促进住房保障全覆盖、建立完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等。

(五) 加强区际合作,积极落实“先富带动后富”

“先富带动后富”是“共同富裕”的初心。在各地积极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区际合作、对口支援是落实“两个大局”、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发达地区要与自然禀赋较弱、发展滞后地区一起探索创新区际合作模式、加强区际合作力度,落实“先富带动后富”。第一,探索区际要素统筹利用。相对落后地区往往存在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这正是发达地区紧缺的,可以通过对口产业转移、合作建设飞地园区、对口劳务培训与输出等模式,促进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共赢。第二,加强区际公共服务合作。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较高,落后地区公共服务人才、资金、理念

等往往比较滞后,可以通过人才交流、建立跨地分支机构、智慧共享服务等模式,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口帮扶,带动落后地区公共服务和综合福祉水平提升。第三,推进区际产品市场共享。积极推动落后地区特色农产品、菜篮子工程,通过产品市场共享提高农产品上行的规模和效率,以此带动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第四,积极探索和加强其他领域区际合作。促进落后地区生态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合作互补,创新推进生态补偿、碳排放等领域的区际合作,创新推进营商环境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区际合作。

结语

中国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地区之间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之一。地区收敛理论旨在研究贫穷地区能否以及如何达到发达地区水平,为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利用中国1981-2020年省级数据和2000-2019年城市数据分析了地区经济收敛特征,结合其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地区收敛和共同富裕的建议。主要结论包括:第一,利用两类数据分析均发现,地区发展总体表现出显著的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但2014年以来收敛特征不显著。其中,在改革开放之初到1994年前后阶段,各地人均GDP收敛但人均收入发散,这体现了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的差异,与此期间限制人口迁移的政策有关。由于城市数据样本较多,城市之间人均收入表现出相对平稳的收敛特征。第二,分类型样本的俱乐部收敛特征显著,且 β 系数均与总体样本模型接近,省级数据滞后10年期的分类型样本模型 β 系数约为-0.09,城市数据滞后10年期的分类型样本模型 β 系数约为-0.11;非直辖市省份之间收入差距较小、收敛特征更显著,这与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其他省份有关。第三,结合经济增长和地区收敛、区域和城市经济等相关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由于地区之间技术、制度的差异较小,从而影响地区收敛的因素主要包括要素流动限制以及自然禀赋、人文环境的异质性,同时也与空间均衡关系的客观规律有关。第四,结合地区收敛和地区之间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为促进地区之间共同富裕,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要素流动性,按禀赋促进空间分工和专业化,优化各地营商环境,推进服务

均等实现高水平福祉空间均衡,同时要加强区际合作,落实“两个大局”中“先富带动后富”的承诺。

注释:

①实现共同富裕要求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体收入差距。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②此处的 β 系数相当于Barro(1991)中初始值的系数 $-(1-e^{-(\beta T)})/T$,其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了式中的 β 。考虑其中的 e 和 T 均为常数,不影响收敛的本质,且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故直接估计初始值的系数。

③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强调了要素流动对地区收敛的重要性;Acemoglu(2009)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总结为直接原因(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根本原因(运气、地理、文化、制度)。本文中的要素流动限制对应于要素流动和要素投入,自然禀赋差异对应于地理因素,人文环境差异对应于文化和制度因素。

④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的,而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

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2018-12-12。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求是, 2021(20).
- [2]Barro R J, Sala-i-Martin X. Convergence Across States and Regions[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1(1).
- [3]Barro R,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4.
- [4]许召元, 李善同. 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J]. 经济研究, 2006(7).
- [5]沈坤荣, 唐文健.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经济收敛性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5).
- [6]刘生龙, 王亚华, 胡鞍钢. 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9(9).
- [7]潘文卿.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1).
- [8]傅晓霞, 吴利学. 技术效率、资本深化与地区差异——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地区收敛分析[J]. 经济研究, 2006(10).
- [9]沈坤荣, 马俊. 中国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及其成因研究[J]. 经济研究, 2002(1).
- [10]邓忠奇, 高廷帆, 朱峰. 地区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经济研究, 2020(10).

[11]Acemoglu D.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Glaeser E L, Gottlieb J D. The Wealth of Citie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9(4).

[13]Hsieh Chang-Tai and Enrico Moretti. Housing constraints and spatial mis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9(2).

[14]Duranton Gilles and Diego Puga. 2019. “Urban Growth and its Aggregate Implic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591, 2019.

[15]苏红键. 中国地区福祉的比较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2020(10).

[16]Cheshire Paul, Magrini Stefano. Population growth in European cities: Weather matters – but only nationally[J]. Regional Studies, 2006(1).

[17]Habakkuk, H. J.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18]Greenspan A. and Wooldridge A. Capitalism in America: A History[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8.

[19]林志明, 唐焰, 杨艳昭, 张丹.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J]. 地理学报, 2007(10).

[20]Michael Kremer & Jack Willis & Yang You, “Converging to Convergence,” NBER Chapters,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21, volume 3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21.

[21]“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的理论逻辑、比较分析及对策建议[J]. 管理世界, 2021(5).

[22]Alonso, William. Location and Land Use: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Land Rent[M].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23]Muth, R. Cities and Hous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69.

[24]Rosen Sherwin. Wages – Based Indexes of Urban Quality of Life. In Current Issues in Urban Economics, edited by Peter Mieszkowski and Mahlon Straszheim, 74 – 10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25]Roback Jennifer. 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6).

[26]苏红键. 中国流动人口城市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6).

[27]苏红键. 空间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经济[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8]苏红键.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与方略[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1(2).

收稿日期 2022-02-16 责任编辑 刘梅